

雲居寺「三絕」來港

17件拓片全球首次展出



▲現場展出的珍貴拓本。



▲明董其昌《寶藏》石經原石。



▲展出的紙經



▲DIY體驗木板拓印《楞嚴經》。



雲居寺山門

董其昌《寶藏》少兩筆？

展覽中的一件吸睛之作，便是明代書畫家董其昌的《寶藏》拓本，現場亦有該書法石拓原件展出。明朝末年，有人刻了十餘部石經，藏在雷音洞旁新鑿的一個小洞中，1631年（明崇禎四年）3月4日，董其昌在洞外刻石右起行書「寶藏」兩個大字，至此才有小西天九洞之稱。董其昌在石上留下的墨寶，後經人製成石拓得以傳世，「寶藏」二字回文「藏寶」，值得反覆品味。

細看又會發現，「藏」字少了偏旁中的兩筆。盧鳴東表示，董其昌此舉非偷工減料，而是另有深意。「減筆」是一種漢字修辭格，它通過直接或間接地有意減少一些漢字的筆畫來表意，讀者可圍繞被減損的漢字來展開聯想和想像。「藏」字少的兩筆，有「埋藏寶藏」之意，恰恰對應了主題「寶藏」（「藏寶」）的內涵。此外，故意隱藏筆畫，也保持了書法工整、筆跡清秀淡雅。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號思白，上海崑



石經拓本
▲明董其昌《寶藏》

江蘇人，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達觀紫柏的弟子，於崇禎四年（1631年）遊雲居寺石經山，看到石經山藏經之巨，工程之浩，發自內心地感慨，乘興寫下「寶藏」二字。雲居寺明朝刻經，始於萬曆末年至崇禎年間（約1620—1644年），當時在南京籍官員、居士，在吳興沙門勸說下，集資在北京石燈庵刻經，然後送往石經山瘞埋。從石經山第六洞刻經題記「華亭董其昌助刻」之語，可知當時董其昌也曾資助過雲居寺的刻經。

中華文化奇蹟-北京房山雲居寺歷史文化展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 李兆基傳視藝大樓顯明均展覽廳

展期：即日起至4月14日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福慧國際慈善基金會攜手中西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和香港浸會大學聯合主辦的「中華文化奇蹟-北京房山雲居寺歷史文化展」正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號稱雲居寺「三絕」的石經、木經和紙經首度來港展覽，其中17件房山石經拓片原件更是全球首次公開展出。雲居寺位於北京西南房山區境內，距市中心70公里，珍藏有14,278方古代石刻大藏經。1961年，雲居寺塔與石經被公布為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次展覽免費對公眾開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雲居寺館藏文物有三萬餘件/套，這次展覽主要遴選石經博物館具代表性的文物，包括隋、唐、遼、金、元、明、清和近代

不同時期的石質、紙質、木質等稀世珍品，共計43件。號稱雲居寺「三絕」的石經、木經和紙經，皆是首度來港展覽，其中17件房山石經拓片原件更是全球首次公開展出。

福慧國際慈善基金會項目發展委員會主席鍾輝英表示：「是次展覽為公益文化推廣項目，旨在弘揚中華文化；把歷經千年的刻經史、珍貴非凡的石紙木經文化、國寶級北方名剎——雲居寺帶進香港特別行政區，讓公眾能深入了解中國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秉承新時代文物保護方針，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活起來。」展覽旨在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讓更多的人認識雲居寺豐厚的文化底蘊，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走過六朝千年未中斷

房山石經刊刻始於隋大業年間（605-618年），高僧靜琬駐錫幽州智泉寺，鑿於北魏、北周兩次滅佛，故在荒僻的白帶山上艱難開創刻經事業，試圖躲避末法時期法難的到來。

「白帶山一帶，匠人多，毗鄰大石窩，石頭原料好。」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說。基於優良的地理條件，及後世對佛經的保護，雲居寺歷經由隋至明六個朝代，綿延1,039年，鐫刻佛經1,122部、3,572卷、14,278方，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石刻圖書館，創造出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蹟。

房山石經分藏於石經山九個藏經洞和雲居寺石經地宮中。佛教信眾為了共同的信仰，採取刻經於石的辦法傳播經典。自靜琬創刻以來，代代相傳，刻經不止。沒有了國度的界限，沒有了朝代的變遷，沒有了尊卑貴賤，朝廷帝王、地方長官、皇親貴戚慷慨資助，黎民百姓爭相仿效，十人、百人、千人……傳而不絕。房山石經鑿刻出的「堅韌不拔、鏤而不捨、一絲不苟、默默奉獻」精神，亦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承典範。

「三絕」經文助文化研究

雲居寺石經博物館內珍藏着的石經、紙

經、木版經號稱「三絕」。盧鳴東教授介紹，東漢時期造紙術普及醞釀了紙經；石經則是興起於魏晉南北朝，為保護佛學文獻，將經文雕刻在石頭上；到了唐代，木雕技術發達，雕刻一本木經便可拓印出許多。

雲居寺作為一座綜合歷史文化的信息庫，在歷史、藝術等方面具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而「房山石經」是一部自隋唐以來綿延千年的佛教經典，不僅在佛教研究、政治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在書法藝術上也有着重要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像這樣大規模刊刻，歷史這樣長久，確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壯舉，堪與文明寰宇的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相媲美，是世上稀有而珍貴的文化遺產，被譽為「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

今次全球首次展出的17件拓片都是遼金時期刻的石經，主辦方表示，「之前這部分拓片一直收藏在文物庫房，這次展出主要是讓觀眾不僅看到千年以來漢字、書法藝術和版式設計的風格的發展與變遷，還能欣賞到版本價值極高的佛教經典。」該部分拓片發掘、整理於1956年到1958年，石經原件現保存在由原址修建、恒溫恒濕、完全密封的石經地宮中。

盧鳴東教授亦組織了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生，為此展覽參觀者提供粵語或普通話導賞服務，講解文物背後的故事，每個導賞團約20分鐘。

DIY與VR帶來沉浸式體驗

為了讓展覽內容更易被大眾理解，展覽以雲居寺千年刻經史為主線，通過「雲居春秋」「刻經偉業」「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四個部分展開，配合圖文實物、攝影作品以及現場非遺互動體驗，從不同方面介紹雲居寺特色文化和深厚底蘊，呈現給觀眾一道集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於一體的文化盛宴，使觀眾感悟房山石經文化的博大精深。

現場觀眾可以參與體驗木經板拓印《楞嚴經》及「線刻飛象」，親身嘗試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印刷工藝。在展覽互動區，觀眾還可佩戴VR眼鏡「穿越」到北京房山雲居寺，實現遠距離的虛擬漫遊，真實再現最早刻經之地——石經山藏經洞（雷音洞）的石經，利用高新科技為展覽增添知識性和趣味性。

主辦方透露，今次展覽的香港首站結束後，有意到馬來西亞、泰國及新加坡開展，讓更多觀眾領略古蹟風光的同時，共同攜手保護好、傳承好房山石經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



◆觀眾透過VR眼鏡可看到的雲居寺景觀。主辦方供圖



《海會圖》的多重研究角度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

本次展出的清刻《海會圖》拓本描繪了群星會集、眾神相聚的場景。該圖也稱「全佛圖」「佛說法變相圖」，是清代雍正年間雕刻的龍藏木經中唯一一塊「全佛板」印刷圖（俗稱海會圖）。畫面以佛祖釋迦牟尼為中軸，四海群神向中心會聚。佛祖寶坐兩旁，繪有兩組神像，神像們服飾各異，有佛教的裝束，也有道教的裝束。

《海會圖》上部，晴空萬里，時有彩雲飄過，四方神佛、二十八宿星官和日、月、歲、鎮、水、火等都紛紛匯攏而來，下部兩角繪有四大天王。此圖整體人物組合較輕鬆自如，五彩祥雲翻騰於神佛身邊，人物的排列既威嚴又舒展，既肅穆又寬鬆，是龍藏木經中的珍品，

彌足珍貴。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以該圖為例，闡述雲居寺石經的研究意義。首先，該木經為佛學研究提供資料，釋迦牟尼成佛後，曾三次集結講法，《海會圖》所繪為第一次在印度的靈山為眾弟子講經說法時的宏大場面。其次，是文學研究，圖中天空上漂浮的祥雲，呼應了中國古代小說中對祥瑞之兆的描寫，如《西遊記》中便寫過五色祥雲。最後，該經也為印度佛學漢化研究提供佐證，圍在釋迦牟尼身旁的四大天王（又稱「四大金剛」），在佛教中只護法護天，但被民間視為掌握「風調雨順」的守護神，如《封神演義》中的四大金剛。



◆清刻《海會圖》

彌足珍貴。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以該圖為例，闡述雲居寺石經的研究意義。首先，該木經為佛學研究提供資料，釋迦牟尼成佛後，曾三次集結講法，《海會圖》所繪為第一次在印度的靈山為眾弟子講經說法時的宏大場面。其次，是文學研究，圖中天空上漂浮的祥雲，呼應了中國古代小說中對祥瑞之兆的描寫，如《西遊記》中便寫過五色祥雲。最後，該經也為印度佛學漢化研究提供佐證，圍在釋迦牟尼身旁的四大天王（又稱「四大金剛」），在佛教中只護法護天，但被民間視為掌握「風調雨順」的守護神，如《封神演義》中的四大金剛。



◆《簪花仕女圖》郵票（1984）

周昉是中國唐代畫家，字仲朗（公元8世紀-9世紀初），一字景玄，京兆（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詳。出身於仕宦之家，遊於卿相間之貴族。曾任越州（今浙江紹興）長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長史別駕，其職位僅次於一州長官刺史。周昉能獲得這個官位與他哥哥的地位有關，其兄周皓隨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戰功。初年學張萱，因此亦長於文辭，擅畫肖像、佛像，其畫風為「衣裳簡勁，彩色柔麗，以豐厚為體。」

周昉作品的特點，據當時人記載是「衣裳簡勁」「彩色柔麗」，所描繪的婦女形象是「以豐厚為體」，這些特點都可以在現存周昉的作品《執扇仕女

圖》、《簪花仕女圖》中見到。周昉曾在長安通化門外新修的章明寺畫壁畫，畫就草稿以後，京城人士來觀者數以萬計，並紛紛提出意見，有人說好，有人指出缺點，周昉虛心傾聽，經過了一個月的修改，使公眾認為完全滿意，而被推許為當時第一。這個故事不僅說明了周昉作為一個優秀的畫家所具有的美德，而且具體說明了宗教美術是如何和群眾的要求與願望得到了結合的。

周昉作畫非常認真，據說創作時不停思考「至於感通夢寐，示現儀儀，傳諸心匠」，夢中見到了所追求的形象。傳世作品畫跡有《五星真形圖》《楊妃出浴圖》《妃子數鸚鵡圖》等72件，著錄於《宣和畫譜》。

◆文：李毅民（高級工程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員，《收藏》雜誌原主編。）

郵壇茶座

《簪花仕女圖》特種郵票

唐代畫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原畫高46厘米，長180厘米，描繪戴花的貴婦人閒散的遊樂生活，畫上共有仕女五人、女侍一人，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中國郵政1984年發行的T.89《中國繪畫·唐·簪花仕女圖》郵票，充分展現了這一畫卷的全貌。通過郵票畫面，除了可以欣賞這幅傳世傑作，還能幫助我們了解唐代的服飾制度和一些風俗時尚。

這套郵票全套有3枚和1枚小型張，設計者是邵柏林。小型張畫面刪去了原畫中歷代所加10餘款印章，恢復了這幅名畫的歷史原貌，邊飾類似中國裝裱字畫形式，使整個小型張顯得古樸大方，韻味十足。它開創了新中國郵票的一個先例——採用古代名畫題材而且破天荒地以狹長篇幅形式的小型張展示原畫的風韻。

設計師邵柏林不滿足於將名畫全貌一覽無餘的小型張，又以3枚郵票，將全畫分割，構成3幅既獨立又相關的畫



◆《簪花仕女圖》郵票小型張（1984）

面。根據構圖，分割得體，並未將原畫平均三等分，卻也保持了原畫完整性。採用大票幅放大圖案，使人如同觀賞名畫的「近景鏡頭」，增強了其藝術感染力。

《簪花仕女圖》取材宮廷婦女的生活，裝飾華麗奢艷的嬪妃們在庭園中閒步。人物體態豐腴，動作從容悠逸，表情安詳平和，嬪妃們的身份及生活特點表現得很充分。環境只是借兩隻鶴和小狗暗示出來而未加以直接的描寫，在形象及動態的刻畫方面十分成功。

仕女畫中最通行的主題就是古代貴族婦女們狹窄貧乏的生活中的寂寞、閒散和無聊。畫家不僅描寫了她們華麗的外表，也通過她們的神態揭示了她們的感情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會對於婦女的束縛。